

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

蛇仙

罗辰生作品自选集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蛇 仙

——罗辰生作品自选集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蛇仙:罗辰生作品自选集/罗辰生著. - 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1997.3
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)

ISBN 7-5007-3481-6

I. 蛇… II. 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7848 号

蛇 仙

罗辰生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北景县航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10 印张 印数:10,000 册

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版 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07-3481-6 /G·2273 定价:11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承印厂调换

傻子的道路

——致少年朋友

我有许多绰号都离不开“傻”字

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作家，现在，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作家，我的作品在报纸上和刊物上不断发表，“罗辰生”这三个字出现的次数增多，被我中学时代的老师看到了，他认为这是重名重姓，不会是他教过的那个“罗辰生”。后来，当他知道这个“罗辰生”就是他的弟子时，曾感慨一番，在我的老师看来，在他教过的学生中，能成为作家的，怎么论也论不上我。倒不是因为我学习成绩中庸平常，才智一般，而是因为我有比才智一般更致命的短处，那就是：傻。

我有许多绰号，但每个绰号都没离开这个“傻”字。

在胡同里，大妈们把我叫“大傻小子”。

我爱打篮球，个高一米八三，也算得上虎背熊腰的莽壮大汉；跳得高，跑得快，还有一手“绝活儿”，投篮准确。比赛几分钟，对方就惊呼：“盯住他，盯住傻大个儿！”

后来，我当了小学教师，我想，我再傻也要比小孩子聪明吧。当老师没有几年，我的学生给我起了个外号：罗二傻。

傻就傻吧，为什么要“二傻”呢？

我的学生说，大傻不是我，是安建军。我一听，身上凉了半截儿，因为安建军有大脑炎后遗症，总是拖着两道青鼻涕，念了六年书，从一到十还数不清。

像我这样的“傻”人，却走上聪明人所要从事的事业，居然也被当成作家了。

这是我把这篇文章叫做“傻子的道路”原因之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从事儿童文学事业的人都要有股子傻劲儿。

自画像

我于1943年生于河北省阜城县的一个贫穷农民的家里。那年正巧是羊年，人们说，属羊的人“命苦”。

我的母亲让人给我算了一卦，算命的说，这年“胎水”在正南，是只黑山羊。说我命大，是大福大贵的人。

是啊，如果不是“命大”，恐怕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有几次是绝处逢生，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，里边有没有“艺术虚构”我就不好说了，因为天下作母亲的往往都不能客观地说自己的儿女。

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，遍地盐碱。我父亲在北京干活，家里的几亩薄田由爷爷和母亲耕种。

母亲生下我后不久，就要下地干活，把我放在地头的树荫里。听到我的哭声，从地里跑出来给我喂奶。有一次我醒来，没有哭叫，抓起地上的黄土往嘴里塞，结果，黄土和着口水和鼻涕，把鼻孔和嘴堵住了，哭不出来也透不过气来，

憋得小脸胀红，亏得姐姐赶来及时抠出嘴里的泥土。我这才哭出声来。据说，当时我已气息微弱了。

我会爬了，母亲到地里干活，在屋里用各种东西将我拦好，不知怎么，我爬出“障碍”，爬出院口，爬到井边，双手扒着井沿往下张望，只要再往前一点或者屁股往前一动，也就没有今天这篇文章了。我二大爷从井边过，双手抱住我的双腿，我又免一死。

据我母亲说，我不学走路，只会在地上爬，爬得很快。有一次，我爷爷用鞭子抽了我屁股一下，我站起来就跑。我是个不会走路直接会跑的人。这也似乎暗示出我一生的命运，学习新鲜的东西开头总比别人慢，一旦领会了，就会突飞猛进。

我长到八岁，开始上学。

白天读书，回家做地里的活儿，晚上习武。我的家乡是沧洲，武术之乡。我们村里在清朝出过“武榜眼”，习武之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。练武很苦，两腿红肿，上炕抬不动腿，拉屎不敢蹲。在习武中，那种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、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的江湖义气铸造着我的童年的灵魂。

长到十几岁，已成了一个彪悍的农村“野小子”，一脚黄泥，一头高粱花子，光着脊梁，穿着挽裤腰的裤子。由于手笨，不会挽裤腰，一条裤筒长一条裤筒短，腰里系着柳条，竹篮子扣在脑袋上，露着因风吹日晒而漆黑的脸庞。一手拿着玉米面大饼子，一手握着大葱，吃一口饼子咬一口大葱。渴了，就跑在水沟边，像牛喝水似的灌上几口，吃饱

了，喝足了，就没腔没调儿地在野地里叫着唱着，迎着风奔跑。

我是喝着民族的奶汁长大的

使我第一次和“文学”接触的人是北院的婶子。她是位心灵手巧又很俊俏的小媳妇；她识字，又会讲故事。我常到她屋里去，她很喜欢我。她屋里挂着许多画，像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连理树》，她指着鱼儿给我讲故事，我像着了迷似的听着。

我的家乡文化生活贫乏，唯一的文化生活是听“大鼓书”（河西大鼓），逢年过节或是有的家庭有婚丧嫁娶的事情，就请来说书的。说书的是边说边唱，整部整部的书说，我先后听了《三侠五义》、《金鞭记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施公案》。说书的人很会“系扣儿”，你今天听了，还要吸引你明天再来听。现在看来，我写的作品的故事性较强是深受“说书人”的影响的。可以说，我的作品的风格（如果能称上风格的话）是深受农村人的朴实，江湖人的义气和民族文化民间故事影响的。我是喝着民族文化的奶汁长大的。

童年的我，也有些怪僻。每逢下雨总不着家，爱一个人看那阴云密布的天空中那耀眼的闪电和听震耳欲聋的雷声。在那四周白茫茫的雨中，淋得精湿，在雨水汇成的水流中“挡”拦水，然后扒开一个小口，独自欣赏“人工”急流。

有时在黄昏，坐在原野上，看那绿树叶中的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听“知了”在傍晚时那拖着长声的嘶鸣。每逢

这时，总有一种惆怅和寂寞，此情此景，到现在记忆很深。

十四岁，我来到北京读书。我来北京是考中学的，但一进北京，一头扎进书店，忘记吃饭，贪婪读书，只是读故事性强的书，我个人买的第一本书是《说岳全传》。我的父亲很为我只读闲书而不准备考试着急。

我当了“公安局局长”

经过考试，我考入北京第九十中学。

第九十中学在天桥附近，当时的天桥是著名的民间游乐场，说书、唱戏、摔跤、变戏法、卖艺的，三教九流，凡是民间娱乐的“玩意儿”，这儿都有。这样，命运又一次将我引入民间艺术的氛围里。几乎每天中午，我到天桥听说书的。我这个农民的儿子，很自然地一下子溶在这平民百姓的“艺术”里。

在初中，除了读书以外，读了大量的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。只要拿到书，一口气要读完。因为家里生活困难，每逢假期，就去当小工；去做工挣钱，挣出下学期的学费及书钱。

在初中这一段时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对话剧产生了兴趣，这要感谢我的那次“自杀”。

在我们班里，有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话剧团，演出话剧《孤坟鬼影》。说是一个坏人藏在坟里，被两个孩子发现了，报告了公安局，于是，局长派侦察员来逮捕坏人。这个同学让我演公安局长的角色。因为我个头高，说话又有口音，像

个老干部。

在这个话剧里，只有我这个公安局长拿的是砸炮枪，一扣板机，“枪”就响，坏人手里的刀子就掉在地下，手腕上流出血来（红药水）。

当演到这个情节时，“坏人”举起了刀子，我忙扣板机，“枪”没响，我忙把“枪”拿到眼前检查，没想到，这时候“枪”响了，台下同学都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傻局长，自杀了！”

剧因为我演砸了，这个话剧团再也不让我演出了。但是，我对话剧产生了兴趣，连续看了一些话剧，像《白鹭》、《两人行》、《最后一幕》，这些话剧对我以后的创作也起着不小的影响。

初中毕业，因品学兼优，被保送到北京著名的一所中学——汇文中学读书。到汇文中学读书的学生，几乎都有可能到大学读书的。

因为我在假期做小工，所以，我写的作文内容往往新颖，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，我对文科的课程非常感兴趣。

倒霉也倒在作文上了。

大学落榜当了小学教师

考大学时，有两道作文题，我提笔写第一道作文题，写到一半儿，便不知怎么往下写了，又忙改写第二道作文题，没有写完，时间到了。

我落榜了。

在1963年，我被分配到北京崇文区翟家口小学当小学教师。

我刚工作时，教的是刚刚升上三年级的小朋友，他们刚到我家大腿根儿。俗话说：家有二斗粮，不当小孩王。而我，确是很乐意这个工作。除了我喜欢孩子的原因以外，那就是我脑子里的“农民意识”在起作用。

当时，在农村的兄弟们，干一天活儿，工钱才四五分钱。虽说我的工资低微，一个月要挣三十七元，比他们要强得多。这种总是满意知足的想法，总是使我乐观。

我爱我的学生们，手领着手地过马路，他们跳绳我就给拉绳，跟他们一块拍手跳舞，很像个羊群中的骆驼。我像个孩子似的和我的学生在一起，人们是不是瞧得上我这个头这么高的小学教师？我一点儿也不在乎。

我的这些举动，被一位业务能力很强的女教师看中了，得到了她的青睐，她认为我有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后来，她就成了我的太太。

我不满足教给我的学生书本上的那点知识，我希望我的学生在学习上超过别的班级的学生，我给他们讲课外题，我给他们讲故事。

但是，就是因为讲故事，使我陷入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困境。

1964年，“四清”运动开始了。搞运动，能从本单位揪出一个“坏人”来，领导脸上是很有光彩的，有功的，甚至

会提拔的。

因为讲故事，说我利用讲坛，散布资产阶级的“民主、平等、博爱”，散布“战争恐怖论”。当时刚刚二十岁的我，被大会小会的“整态度”、“交代问题”，整得“胡说八道”。我挨了处分，就是说，宣布了我一生中政治上的“死刑”。

我没有资格教课了，安排我教手工课。

“四清”还没结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又接上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比“四清”来势更凶。我这个在“四清”中就挨整的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更是首当其冲，两屋子大字报，说我是“贫下中农的叛徒”、“道德败坏”。总之，一切“罪名”全来了。

最后，有人提议将我轰回老家去。

我大呼冤枉，又准备以死相拼，轰回老家去，有什么脸见“江东父老”？

当时，各派选出代表，组成联合调查组，核实我的“罪行”。没有料到，我的学生们知道我受的冤屈，他们对这些“罪行”一一驳倒，说明事情真相。

在我的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强烈要求下，我又返回我的班级任教。

我爱我的学生，爱孩子，爱他们纯净的心灵。我不愿和成人打交道，觉得随时有被出卖的可能；我心眼少，处理不好成人世界中那些复杂的、在我看来“肮脏”的关系。

因为在我关键时刻，孩子们救了我，所以，当这批学生毕业离开我时，我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

虽然说“四清”中冤枉了我，但又不能给我改正，因为有个文件，叫《保护四清成果》，这样一来，不管是“成果”是“恶果”，谁也不能改动。

在政治上，我没有前途了。但是，年轻人，都不甘心，我想用事实，用我的成绩证明我不是个庸才，我不甘一生庸碌。一句话，要为自己争一口气。

通过“挨整”，我落下一个“病根儿”，自己不敢整人，再有一见到被整的人从心底就同情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成了逍遥派。打球、游泳、恋爱、结婚……直到快三十岁时，我才忽然明白：我要干点事情！因为整我的人个个青云直上了，我认为我的能力不比他们差！我要干出点事情来，让人们瞧一瞧！

干什么呢？一个“机会”悄悄地向我走来，这个机会，使我吃了八年的苦，使我改变了我一生的旅途。但是，这个机会的开始，却是一场悲剧……

写作的“萌动”

有一个姓赵的学生，外号叫“赵大头”，长得大脸盘虎头虎脑的，人很聪明，学习也好。老师们说，如果在以前，他会考入大学深造的。

有一位老师反映：赵大头读“黄书”。

有一天我去上班，发现赵大头走在前边，一边走一边捧着一本书看。我平时跟学生们历来是随便的。我悄悄地走过去，一把夺过书本，说：“看的什么书？”

他看的是欧阳山先生写的《三家巷》。

我读过这本书，也喜欢这本书。我又知道，这本书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曾遭到过批评，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还能不是本坏书？我说：“这本书可不能读呀！”

他说：“老师，您借给我几本书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能借给你的也只有老三篇（毛泽东同志写的）。”

后来，他小学毕业到中学读书。他果真读起了坏书，还和人结成“团伙”，溜门撬锁，犯了罪被逮捕。

那时讲究大批判，实际上是批判别人，吓唬孩子们。

学校里要把他拉回学校批判，让我写发言稿来批判他。

我爱我的学生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。别看我个头高大，而在感情上又很脆弱，也可以叫很丰富吧。不能见到哭的，见到哭的就陪着掉泪；怕听“软”话，经不起别人的央求。那天夜里，我铺好纸提笔写批判稿，不知道写什么好，在我眼前，浮现出来的总是“大头”那天真顽皮的样子，和罪犯的形象怎么也连不起来。

那就写坏书把他教坏的吧。从这个角度，很快将稿子写好了。

第二天，在全校批判会上，警察押着赵大头走上台，他带着手铐，破衣烂裤，因为是在母校，在自己的老师跟前，不愿掉“份儿”，要摆出一副“威武不屈”的样子，他不驯服地晃着身子，摇着脑袋。但是，当他听到我发言的声音，他一动不动，规规矩矩地低着头弯着腰。

批判会结束了，警察押着他走，我站在校门口等着他，当他看到我时，他的眼泪“唰”地流了下来，我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

为孩子写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

从此，在各种场合，我就呼吁：“为什么没有孩子们读的书呢？”当然，谁也回答不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校领导找我，说是不知从上边哪条渠道下来一个任务，让每个学校给孩子们写一篇故事。校领导说：“罗老师，您就来完成吧。”

我很为难，忙说：“别看我呼吁要给孩子书看，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书呀！”

校领导说：“管他好坏呢，写了交上去咱就完成任务啦。”我奉命完成任务，哪里知道，我人生的旅途的转折点从此开始。

我憋了一些日子，憋出了一篇叫《三次家访》的东西，写的是一位老师通过三次家访发现了自己的学生做小提琴的秘密。

写完以后，交给了区文化馆。

当时负责区文化馆文学创作的是马铁、田国政（现任北京出版社文学部编审），郁德生（现任《中国文化报》的负责人）。他们看完后，认为语言流畅叙述明白，就推荐给《北京日报》文学部，让我去找李凤祥同志。

我拿着稿子，既抱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来到《北京日

报》社的接待室。

李凤祥同志看完稿子问我：“您是写小说还是散文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是小说？什么是散文？”

李凤祥同志说：“小说是写人物的，小说的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。您的这篇作品，情节写得很热闹，而把人物淹没了。……”

他给我讲起了“文学概论”来。

李凤祥同志曾帮助过不少作者，以致这些一般作者后来成了“家”。在那个年代，真正的“文学概论”早就被批判了，而他，给我讲了几个小时的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。到现在，如果说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比较正，这跟我的这位“启蒙”老师有关。我是感谢他的。

第一次作品失败了。我以后能成功也多亏了这次的失败。因为成功了，我也就不会写了；失败，逗起了我的“犟”脾气，我就不相信我写不出小说来！在当时，人们不愿提笔写东西，因为有许多人拿着“阶级斗争”的放大镜在你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毛病，说不定今天发表了作品，明天就成了“阶下囚”。

我的那股“傻劲儿”成全了我。

从此，我不分昼夜地写上了，一写就是八年。八年，抗战都胜利了，我仍一事无成！

八年“抗战”

说起这八年，也是一把辛酸泪。

还没有写出一篇作品，便遭到了冷嘲热讽，什么“不务正业”、“想成名成家”。

我的家人当时也不愿让我写，我的太太因为写日记几乎落个“写反动日记”的罪名；十几本日记交出来让人审查，这就等于把一位姑娘的心让众人践踏。她伤心透了，对于我写小说，她是不赞成的，为了全家也是为了我。有的人甚至说：“他还想成为作家？也不看看，他家祖坟上长着那根蒿子没有？”

苦，还不止是思想上来的压力，还有经济上的。

我当时每月工资三十七元，这点收入，上有老母下有幼儿，本身就苦不堪言。整夜的熬夜，还要抽烟，只得买几分钱一包的燎嗓子的烟。熬上一宿半夜，早晨不吃东西又要上班。

一天，连着上四节课，到第四节课，因为劳累和饥饿，眼前发黑两耳嗡鸣，向学生借了一毛钱买了个火烧吃，这才稳下神来。

在这里，不妨说几件小事。

我一把心思用在写小说上，人像傻了似的，本来就傻，这会儿就傻得更邪乎了。

我骑车把儿子送托儿所，把儿子往车大梁上一放，上车就走（骑车带孩子是违反交通规则的），出了胡同上了大街在十字路口又闯了红灯。直到警察冲我呼喊这才醒悟过来。

我忙对警察说：“我不是成心的。”

警察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是成心的，我还没见过骑车带孩

子闯红灯的！你想什么呢？两眼发直不想活啦？”

每天路灯一亮，就要倒垃圾，我端着装垃圾的土箱到了垃圾站，往下一扣，土箱子一扔转身就走了，就这样，连着丢了几个土箱子。

一天，管理垃圾的大爷提着土箱子找到家来，说：“你们家土箱子是不是富余？怎么一天扔一个呢？”

我的写字台的一些抽屉都堆着写满字的稿纸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我结识了一些热心肠的人，他们热心的帮助与指正，使我受益非浅。

第一位就是钱世明同志。当时，他的住家距我家不远，我常到他家串门（现在，他是作家与学者，《易经》专家，人称文坛上的一位怪杰。）。

他建议我多读些书，于是，我找到孙犁的《荷花淀》，找到茹志娟的《静静的产院》来读，可以说孙犁的那种清秀的荷花香味的文风感染了我，茹志娟的那种细腻的独具风采的细节描写影响了我。当然，他们的作品的风格不止这些，而当时我能体会到的这点最深。

我读浩然的文章，我觉得，我受浩然的影响是极深的。因为浩然就生活在北京，他的讲座我是场场必到，而且还提出一些问题，他都耐心回答。比如，有一次浩然在北京汇文中学接待一位美国学者时，我提一个问题：“请您以自己的一篇小说为例，讲一讲怎样构思的？生活中给予您的素材是什么？您怎样根据这些素材写成一篇小说的？”当时，虽说有外国朋友在场，浩然仍以他的短篇小说《红果蜜》为例讲